

主体与流动——转型期藏族诗歌的族裔空间问题

刘光健 (Liu Guangjian)¹, 张慧诚 (Zhang Huicheng)²

摘要: 空间转向作为晚近人文科学研究的新趋势, 同样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提供了新视角。作为文学空间, 少数民族文学展现了话语权力的撞击与再编组; 作为社会生产的结果, 少数民族文学中的族裔空间呈现了活跃和多面的想象维度。以转型期藏族诗歌为研究对象, 深入剖析文学层面族裔空间的构建及其意义价值, 揭示其中族裔空间的社会构建和文化意义, 如此方法论, 不仅是一种从传统时间/历史角度转向空间角度的学术探索, 而且对于深化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理解,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 主体; 流动; 藏族诗歌; 自我阐释; 族裔空间

Title: Subjectivity and Mobility: Ethnic Spatiality in Tibetan Poetry during the Transition Period

Abstract: The spatial turn, as a new trend in the study of the humanities, has provided a fresh perspective for the exploration of Chinese minority literature. As a literary space, ethnic minority literature demonstrates the impact and reorganization of discursive power; as a result of social production, ethnic space in ethnic minority literature presents an active and multifaceted dimension of imagination. Taking Tibetan poetry in the transition period as the object of study, this methodology involves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ethnic space and its significance and value at the literary level, revealing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and cultural significance of ethnic space. This approach not only represents an academic shift from the traditional time/historical perspective to the spatial perspective but also has a far-reaching influence on deepening the 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minority literature and fostering the sense of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Keywords: Subjectivity; Mobility; Tibetan Poetry; Self-interpretation; Ethnic Spatiality

Received: 12 Jan 2025 / Revised: 25 Mar 2025 / Accepted: 1 Apr 2025 / Published online: 30 Apr 2025 / Print published: 30 May 2025; Print ISSN: 3078-8129 · Online ISSN: 3104-5073 / by *JLWE*, Vol.1, No.1, 2025, pp.102-113.

¹ 刘光健(Liu Guangjian), 广州新华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教师, 研究方向: 中国现当代文学, 中国现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电邮: lgjofficial@163.com。

² 张慧诚(Zhang Huicheng) (通讯作者), 广州新华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 研究方向: 中国传统文化, 外国文学。电邮: 877809446@qq.com。

空间转向是晚近以来人文科学的一种新研究路径，它致力于摆脱前现代时期奉时间/历史为主臬的研究范式，试图超越自然科学在气候与地理形势等层面对空间的物质性解释。二十世纪后的空间研究，发现空间的社会性及社会关系，把时间序列中的空间付还给具体的地方或场景，将其看作社会生产的产物，这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亦有启发。

一、空间视野的转向

当十九世纪热力学对熵增定律的发现为“时间神话”一槌定音，永恒前进的时间/历史被标举成不为人所能动的理性、客观的注脚，我们难免围绕发展、中止、危机与循环的主题去认知与观察社区、国家，乃至世界的发展情况。空间的研究被内缩进时间的范畴。在西方经典中，空间被时间与历史所统摄至少维持到18世纪，直至19世纪各式现代性运动以人为锚定与根本，视线焦点才转移至人的生命、经验与历史均融蚀其中的空间。发端于晚清的中西方交互博弈，使得自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降逐渐定型的西方现代性发展模型成为现代中国观摩、鉴采的对象。再者，中国文学历来亦有“史学传统”之说，“以时统空”的认知哲学不乏其例。这种对时间向度的迷恋与依赖业已内化作文学研究的某种惯性。

对“恒定”的时间之轴作出的质疑集中在1970年代之后，思想的“空间转向”使得包括文学研究在内的人文社科，将理论权重从传统的时间依赖转移到此际存在于空间围合中的体验、观察。在历经法国空间理论学家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对空间概念的反思和刷新，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大卫·哈维（David Harvey）、爱德华·苏贾（Edward W. Soja）等人引入后现代视野的拓界，空间理念已丛聚成一定的谱系形态。詹明信（Fredric Jameson, 1997, p.450）直言：“在日常生活里，我们的心理经验及文化语言都已经让位空间的范畴，而非时间的范畴支配着。”空间研究作为一套认知体系和介入机制，其指涉的社会秩序、生产关系、文化心理、性别差异、族群碰撞等问题，让文学内外部空间的异质性与暧昧关系得到透视，文学阅读和阐释更具多重性。当文学空间不再桎梏于背景故事或地方风俗的直白认识，对自然地理、社会环境、地域文化、特殊建筑、异质地点等不同空间的意义阐发，使文学研究对文学生产、传播、流通、消费的认知更为多元，一如刘大先（2011）所论：“文学生产、文学文本、文学研究都成为一种互文性的空间结构”。

就中国文学地理学而言，李怡（2020；2022）提出的“地方路径”研究法得到颇多回应与支持，其对空间意识的深化，从动态的持续生成意义的“地方”，深究文学中国的全局调整和总体建构。

“地方”对空间的牵引拓展，自然推动了以“族群”、“移动”等为线索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思考，其中刘大先的论述甚是可观。他既看到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族群在“地方化——天下化——再地方化——中国化”交叉轮转的认知、认同变化，也看到作为“地方”空间的“边疆/边地”的政治实践

和范式转型意义,及附于其上的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与民族国家观念之间的同构性。因少数民族及其文学在地理中国与文学中国的特定位置,从空间/地理的角度介入研究,在当下多种文明碰撞轳轳的世界格局中,有着旗帜鲜明的现实意义。

当然,一种思维模式的鼎新,并不全然是对此前认识的推翻。对空间问题的警醒是为了注意到时间连续性与空间同存性交错延展的有力互动,正如福柯(2001, p.21)所言:“我们并非生活在一个我们得以安置个体与实物的虚空(void)中,我们并非生活在一个被光线变化之阴影渲染的虚空中,而是生活在一种关系中,这些关系描绘了不同的基地(site),而它们不能彼此化约,更绝对不能相互叠合。”历史在新的空间观念的烛照下再次显现意义。但西方空间理论注定无法顺畅地抵达文学中国的每个角落。无论是万国来朝的家天下式帝国还是现代政治意义的民族国家,对内外空间、边疆、族群动线等问题的考量,都无法远离或共时或历时的时间话语模式。同时,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领域过于强调空间思维的运用,容易陷入地方文化的机械化理解或单一民族本质化处理的话语陷阱,在政治上形成空间的“分离主义”或“区域崇拜”的危险想象,这是一种与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和中国各民族广泛交流交融交往现实大相径庭的错误观点。故此,本文意在有选择性地采用空间视野,审慎地从地理、民族的角度分析1980-1990年代藏族诗歌中的族裔空间生产问题。

二、民族文学中的族裔空间

“空间生产”,源于列斐伏尔于1974年出版的同名著作《空间的生产》。这个词汇从使用开始便把“空间”看作一种具体抽象物(abstractions concretes)(2021, p.41),提出空间与社会生产紧密关联的理论假设。如此构想,列氏割舍了将空间视作独立自在的物理现实或作为先验性感知认识的理解,主张空间的被生产性,认定“人类以其身体性与感觉性、感知与想象,思维与意识形态,通过他们的活动与时间,进入彼此的相互联系之中。”(2021, p.xv)为诠释空间生产的程序。他提出“三重辩证关系说”(或称三元性辩证法),即任何由社会关系所生产的空间都被“社会实践(spatial practices)”、“空间的表象(representations of space)”与“表征性空间(spaces of representation)”所辩证地混合与设计。

简单而言,第一环节指社会空间的现实生活实践,各种社会活动、技术或主体关系的交互链接,这些互动发生于特定的地理地形或建筑环境。第二环节,空间的表象在语言学上可理解为“隐喻(Metaphor)”,意为语言的描述将空间实践规定为某种空间,从而建构起空间的表象。这种经过语言组织化处理的表象为观者提供可供交流的认知框架,一种空间表象可以被另一种似是而非的表象所代替,指明具象可感的空间画面,诸如“集中营与地狱”,“伟人故居与圣地”。第三环节,表征性空间关注空间的象征层面,指向语言为空间赋予意义,空间与某种物质象征物或秩序、经验产生关联的过程。在此维度,表征性空间超越空间本身而对接它物,是社会规范、条例与情感倾向的再度

阐释与引申，如“国家首都与神圣权力”，“边疆地区与神圣主权”，“人造纪念碑与荣耀法则”，具有表达价值的传播工具性质。

在当代空间视野里，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提出“文学场（Literary Field）”理论把整块文学产业都纳入空间的考量，一如对空间生产的社会性预设，文学空间的生产是一个由相对性知识以及不断演变的认识和意识形态所渗透的过程。变动的知识形态和特定的思想体系赋予文学场域以活力和价值，使其成为一个充满动态交互和意义生成的社会空间。也由此，作为一个混合异质的多元空间，文学空间的内在肌理（texture）常受到有效知识、集体想象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干预和修正，是投射着资本与消费、保守与变革、畸变与正典等各式权力话语的质的流动的场域。应生产关系、文化符号、权力意志召唤而产生的文学场，天然与文明、政治、社会等因素密不可分。布迪厄（2001）认为：

“文化作品的科学意味着同样必要且与作品理解的社会现实的三个层次必不可分的三个步骤：第一，分析权力场内部的文学场（等）位置及其时间进展；第二，分析文学场（等）的内部结构，文学场就是一个遵循自身的运行和变化规律的空间，内部结构就是个体或集团占据的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结构，这些个体或集团处于为合法性而竞争的形势下；最后，分析这些位置的占据者的习性的产生，也就是支配权系统，这些系统是文学场（等）内部的社会轨迹和位置的产物，在这个位置上找到一个多多少少有利于现实化的机会（场的建设是社会轨迹建设的逻辑先决条件，社会轨迹的建设是在场中连续占据的位置系列）。”（p.262）

有如一切文学，少数民族文学亦构建出自身的文学场，且与我国少数民族的现实情境同协共振，在文学制度的表述法则下形成内嵌于文学空间的族裔空间，是国家意识形态、作家民族意识、学者自身见解与读者群体幻想彼此孳杂的产物。少数民族文学中的族裔空间常因四者权重的变化差异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出于当代语境中少数民族文学发生的后设性建构，族裔空间作为一种文学表达，往往囿于国家意识形态的介入方式及力度。回溯 1978 至 1990 年代文化体制的历史转型和现代化方案，不难发觉极端政治宰制的让渡拓展了民族性的表达空间。在取得合理性和合法性的前提下，个人、民族述求和国家述求的表达之间存有一定回寰、斡旋的余地。“但这只是说明，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的关系变得较为间接和隐晦，而绝非不再相关。从表面看，通过更为合理地划分疆界，学术与政治的分工关系变得更加明确和固定，但是如已所述，现代性思想的隐性意识形态对于民族与个人诉求的深层制约却从来没有被割断。”（吕微，2001，p.7）在这种曲折、非显性的规范中，追求民族现代化和自我阐述的民族作家们，忽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创作活力。打破此前一体化的社会文化格局，质疑“他者审视”的方法论，确立特定的文化身份认同，是此时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中形成

一股思潮。

循此，民族文学中的族裔空间在发生机制上出现了转变。出于少数民族文化象征资本的自觉运用，对他者文化代言人的怀疑和对自我文化真实阐释的愿景，转型期少数民族文学通常采用“博物志”的书写方式将我族我地的文化样本和我行我住的实地感受并行应用，从“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光”（Geertz C., 2000）在文学层面形塑族裔空间。以藏族文学为例，高原、雪山、圣湖、牦牛、糌粑、僧侣、经幡、转经轮、玛尼石、酥油茶等物象的高频出现，一个迥异于主流民族社会的藏地空间便通过语言文字直达他族遐想，神秘、辽远、迷人的高原旋律汇成西藏文化的集体想象热潮。

然而想象是双向的。过于澎湃的民族情绪和脱轨错位的主权意识，滋生文化民族主义的同时也会将“自我幻想”传染到本民族的身份界定和文化迷思。少数民族的文化精英们，很有可能源于不同的文化立场和受益管道，将自身的民族文化根性进行选择、变形、扭曲，商业性质的自我风情化和政治意味的二元式碰撞是其中典型。少数民族文学的族裔空间和现实的少数民族家园在现代中国是互为镜像又彼此汲取。前者之于主流文学是异质空间，后者之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是特定空间。如何从少数民族文学理解中国，从边地动线整合中国版图，首先需要思考族裔空间的形成过程。

三、主体的流动与流动的主体

姚新勇（2016, p.109）对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化民族主义的空间建构提出“三类四种”的归纳：（一）族裔独属性、排斥性较强的族性空间。（二）族裔归属单一性较明显，但排斥性并不太强的族性空间。（三）具有中国整体性的异质性族裔空间的建构，又分为“以某一族群为核心的族裔家园于中国家园的建构”和“以跨族群或超族群身份来想象富于族裔异质性的整体中国”。其间，诗歌文体作为现代文学之驿骑，因其物象堆栈、结构轻盈的特点，对民族文学中族裔空间的建构尤为突出。

承前所述，转型期一元式话语的坍塌，民族意识的浮出，主体身体的松绑，导致民族新诗在普遍重拾传统以搭建本民族文化认同的同时，大都通过诗人主体或诗中主人翁的身体流动来构建族裔空间的想象。这些主体既代表个体也象征群体，在涂抹上英雄主义的光辉后，多半被放置在荒蛮边地，暗地里传达一种理想主义的情操。换言之，眼见即所得的边境漫游，将主体的“放逐荒野”幻化成带有浪漫情调的个体英雄主义行为。尽管诗中所描绘的身体流动似乎架设了连接现实困境与历史辉煌的桥梁，但大多都只是建立在败瓦残垣和边疆风物的浅尝辄止。如此深情的喟叹，实质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拒绝承担真正严肃的意义和反思。

另一方面，民族新诗对族裔空间的建构也符合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合法性危机理论与安东尼·史密斯（Anthony D. Smith）民族认同理论的一般性概括。即，它们都是固有的国家、民族、个人身份认同等范式，在文化转型期社会陷入公共性危机——当下社会机制无法满足公众情感/理性需求，无法提供普遍化的动因——的集体反应，表征着价值重建、意义激发、认同再寻的努力。这

一点,我们可以从民族诗歌中主体在民族家园的徘徊,对物象的留恋,对已逝鬼魂的召唤等行为中看出,民族诗人们或隐或显地通过建立理解门槛来编织作品中非主流的异质性,既指认了他者的实际存在,又完成了族群身份的筛选。

回到具体的研究对象,以转型期藏族诗歌为例,才旺瑙如、旺秀才丹主编的《藏族当代诗人诗选》和色波主编的《前定的念珠》是较为重要的诗歌集子。本文将按照“主体的流动”和“流动的”主体”的介入方式,依次论述藏族诗歌对藏族族裔空间的构建。首先,是大规模描绘藏地风光的诗歌。如才旺瑙如的组诗《雪域之魂》编排了海量高原雪域的意象,在诗人的圣地逡巡中,阿尼玛卿山、桑科草原、阿木涅果拉山、牧羊人、水葬等意象群释放着苦难与神圣交织的光环,“沉默”、“辉煌”、“纯洁”的字样营造出肃穆又傲岸的藏地风光。同类型的还有《塔尔寺的灵光》、组诗《行吟:谁将为我挥动手帕》,列美平措的《荒原·篝火·驮脚汉》、《扎聂》,唯色《前定的念珠》,阿卓《关于西藏鸟类的四首十四行诗及两首副歌》、《关于西藏植物的四首十四行诗》,扎西才让的组诗《在甘南桑科》、格桑多杰《玛卿雪山的名字》等。

生长于斯的藏人们对藏地风土的赞叹和描绘,实质与主流文坛自古便有的咏物言志传统别无二致。只是东西方政治话语在这片土地上的博弈,加之“东方主义式”的偏见、“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文旅消费、文创产品的流水制造,使诗人们的咏叹和迷醉也成为了诱导式的广告标语,加入进“心灵净化”、“高洁神圣”、“浪漫神秘”的“香格里拉-乌托邦”想象内循环。在这一时期,藏族新诗所构建的族裔空间与现实中“西藏文化热”的乌托邦式幻想合作鼓荡之势,促成了对西藏文化的再魅化。在这种文化想象中,西藏被描绘为一种固有的、纯粹的、与宗教紧密相连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同时又被时尚和西方视角所追捧的存在。这种文化形象成为了不容置疑的神圣实体,被置于一种广受他者崇拜的陌生地域的语境之中。而西藏的过去,包括它政教合一和奴隶制的历史,也经历了一种选择性的重构,要么被滥情地理想化,要么被有意地忽略,创造出一个超然于真实的神话化存在。不可否认这些作品中对西藏、藏族的皈依和认同是真挚的,但与小资时尚及中产趣味的耦合,逢此产生的藏地空间更象是文化消费下彼此心领神会的集体狂欢。

其次,是突出主体身体的行走行为的诗歌。不同于前一类型民族诗歌中诗人主体直接对风物场景的咏物寓情,此类诗人们选择彰显动态的身体。解放的身体与族裔空间景观产生连续性关联,移步易景的过程不仅为诗歌添增叙事的可能,还使身体成为存在性的中介式符号,连接浓烈的族裔文化特征与新型的身份认同界定。值得一提的是,这些身体的呈现状态大多是健康有力且正值壮年,它们表现出较为积极主动的进取和探索,承载不同的文化立场与价值取向。这类主体身体的大量出现,或是当时政治氛围和族群关系的另类隐喻。此间最有代表性的藏族诗歌是阿来的组诗《三十周岁时漫游若尔盖大草原》。而立之年的阿来以“一个从平凡感知奇异的旅者”身份,凭借“双腿结实有力”、“身体逐渐强壮”,“诗人帝王一般/巫师一般穿过草原”。其身体所向、感官所及之处,不仅

是位于青藏高原东部诺尔盖草原上的人事物，更是以这些物象为镜，对自身再定位和重新认知。

福柯（2001, p.18-21）曾提出“异托邦（Heterotopias）”概念，指在现实社会的组织架构与制度规划之中，或在社会成员心智的激发与想象之下，孕育而生的一种异质性的空间。所谓的异托邦，乃是一种既得名于社会共识、又遭社会边缘化的空间实体。它位于现实社会的范畴之内，却由权力机构所预设与构想。异托邦的定位在虚构与实际构筑的模糊地带，内含着行动的可能性、实时性的现实感以及个体间的互动潜能。这一空间虽然被社会赋予了特定的意义和地位，却在社会的整体结构中处于某种被“另眼相看”的边际地带。它进退于现实与虚构的界线，既是实际存在的空间，又充满了想象与构建的维度，提供了实践、实时性和人际交互的可能性。福柯进一步以镜子为例，具象化异托邦的特性。在镜子中，个体观察到自己的倒影，既是一种存在，又是一种幻象。这种视觉体验反映了异托邦空间的本质：它既是现实的一部分，又因其幻象性而与现实保持距离。个体在镜中的凝视，既是对自我存在的确认，也是对自己认同的重构。镜子作为一种差异空间，它在瞬间将个体所在的地方变得既真实又虚幻，因为只有透过这层幻象，个体才能感知到自我。然而福柯的观点未必能直接套用进中国的民族情形，因此在后续的论述中，笔者并不将现实中的民族集聚地或政治性划分的民族自治区域看作异托邦。相反，本文旨在探讨民族文学如何塑造出一个与异托邦概念相契合的族裔空间。

异托邦和前述的乌托邦有所关联。倘若乌托邦指向偏离现实社会的完美虚构地点，异托邦则指向内置于现实社会，由权力部门规定和设置的真实异质空间。现实社会作为一种中立性文化资源，乌托邦将其变幻至遥远的、精神的、语言的虚构空间，异托邦则将其纳入自身，循其另类的特定功能与位置，形成隔离又开放，排斥主流又呼唤主流的特性。从此类藏族诗歌的写作语言（特指汉文藏诗）、出版选择、物象堆砌、诗人立场等可以看到，文学层面的藏族空间就是一面照映出主体与其对调冲突的反影的镜子。由高原到草地，由牧场到佛寺，由圣湖到雪山，夹杂在虚构与建构中的藏族空间，一面反射出藏人们正常的、日常的生活空间，一面折射出社会的欲望、恐惧与骚动，践行着自我与他者认知、交互的可能。

诗歌中“主体身体”在族裔空间的行走，是另一种“伫立静思”的表现。按照福柯的暗示，他们以景为镜，凝视自我。奔走在地方化的族裔景观中的肉身，看到了现实山河中的自我，也看到了不存在于其中的自我。文学层面的族裔空间就是一处揭开现实表层，借由物质场景跃入感知层面的虚像空间，本族诗人们在此间发现了自身所理解的民族根性中的自己。这一自我循着相同的路径，通过双向凝视，从虚像空间的状态，即从镜面之彼端，重返现实肉身的镜面之此端，继而在诗人身体所行走之处重构诗人自我。星罗棋布的民族诗歌就这样串连作一面面镜子所排列包围的文学世界中的中华民族空间，诗人们以己力行走于本族所在地，再以语言写下诗句，即是一次对见惯不惊的生活空间的穿越和颠覆，或治愈或发现或取悦或重构自我。

一如列美平措（1997, p.93）在组诗《圣地之旅》（第十四首）写道：“我们失去和渴望的东西/将在圣地艰难的旅行中复活。”在身体与空间的感知性互动结构中，除了“主体的流动”这一着重漫步行走、审美观赏或景观凝视的身体行为的视角，还能以“流动的主体”这一侧重身体的鲜明异质性族裔文化色彩的视角进行反向论述。在少数民族作家的实际写作中，文本主人翁（或诗人本身）的民族身份标识大多鲜明，通常都带有浓烈地方性的族裔文化符号，虽然他们不都对本族的礼仪民俗持肯定赞颂态度，也并非刻意表露特定的族裔归属和文化立场，但其民族色彩往往是非常醒目的。

比如嘉央西热的《草原人》（1997）：

“啊 我的草原人/在这古老又年轻的土地上繁衍子孙/满足于雪与雪之间流淌的那行泪水/给草原带来的瞬间的色彩/满足于门前那一片剪下的白云/给牧人生活带来的永久希望/满足于帐篷里青稞袋砌成的墙/满足于银饰木碗里黄澄澄的酥油茶/满足于佛龛前迷惑不解的长明灯”（pp.64-65）

从文本表面来看，民族诗歌中的自觉的民族意识及地方化的族裔文化色彩，似乎主要通过内置的景观模型和生僻的术语来体现。民族文学中的民族意识和地域文化特色，可能仅是对自然地理的表层模仿和简单勾兑，甚至只是语言符号对地理景观的组织。这似乎降低了民族诗歌创作的门槛，使得任何掌握这些词汇的人都能尝试创作。然而，民族诗歌的创作实质远比如此理解复杂。正如姚先勇（2016）剔抉提要地指出：“文学文本中的身体与空间景观的“文化身份关系”是互为条件的，这不仅涉及到文本中的身体與空间的相互依存性，也涉及到具体文本之外的各方面复杂的关系。”（p.118）

主体与文本中的族裔空间之间存在着一种互动性。一方面，主体作为具有特定民族身份或认同取向的实体，其在文本中的行走行为不仅揭示了族裔空间的独特性，而且也展示了这些空间的内在文化属性。另一方面，族裔空间的“民族文化色彩”亦反之为身体赋予了一种特定的文化身份。这种民族身份在文本中得以具体化展现。如此双向调节不仅揭示文本主人翁的形象由作家主体的价值取向所决定，还说明了这种价值取向决定作品所呈现的内容和本族空间的性质。同时，由于文学族裔空间建基与现实族裔空间的客观存在性，其以先于作家创作而存在的特性，对作家的创作视角和表现手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作者能够如何呈现这些空间和人物。

对于读者而言，他们所感知到的主人翁形象和景观，既受到作者的价值取向的影响，也受到文本中景观特质的先验制约。这种双重影响揭示了读者视角的复杂性，即他们所看到的是由作者的认同价值取向所决定的，同时也是由文本中景观特质所影响的。按查尔斯·泰勒（Charles Margrave Taylo, 1998）的说法，个体的自我认同并非孤立形成，而是在社会互动中，通过“他人的承认（recognition）”得以构建。若个体遭遇缺乏认可或遭受歪曲的认可，不仅对自我认同产生深远的负

面影响，而且可能形成一种压迫性力量，将个体限制在一种虚假且受损的存在状态中。这一论述呼应了本文前述乌托邦式族裔空间的诗歌类型，读者（观众）主体的参与和凝视（gaze）同样是导致现代民族文化和族裔空间发生转向的部分因由，是外在性的形式，是读者们希望在“意义他者（significant others）”（George Herbert Mead, 1934）身上得到的某种补偿。而“流动的主体”视角则对此指控进行了补充：他者是永远存在的，他者的想象亦受另一个他者影响，承认的脱位不完全是族外他者自生的恶意或偏见。族内主体的文化立场、认同取向、喜恶导向，在如今过分强调自我阐释、主体意识的多元时代，同样引导着读者的想象方向，甚至更容易在读者眼中制造假设。发生内在性的混乱的我族想象。倘若掌握文化解释权的族内精英无法平等客观地进行文化界定，那么外在给予的尊重、赞扬或祛魅都只会是某种屈尊俯就的故弄玄虚，因为哪怕在汉族内部都充斥着这样的地域想象和认知偏差。

在这一族裔空间的搭建过程中，文本中的主体身体充当了作者、文本景观、读者以及更广泛的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权力关系之间的中介。这种中介作用不仅连接了作者的写作意向和文本中的景观，而且涉及到更为复杂的社会权力话语的存在，体现了写作过程中主体与客体、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动态互动关系。身体的这种结构功能性在各类写作中都具有普遍性，它揭示了文本创作和接受过程中的复杂和多维。但姚氏之论述（2016, p.117）提醒我们，诸如“五七文学”等主流文学分类中的景观和主体，虽因题材、素材提供的边地审美常常带有地域或族裔风情，却不具备形成族裔空间的异质性，更难以与“民族”、“族群”、“领地”等标识相关联。

中国的民族政策基于对少数民族身份的清晰界定，为相关民族政策的施行提供了基础。身份的确立不仅在国家层面确立了个体对其所属民族认同的基本盘，而且在社会实践中不断强化个体的族群归属感。在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领域内，国家为推动该领域的繁荣而制定的制度性安排，包括文学奖项的设置和文学刊物的创办，不仅为少数民族作家提供了展示其作品的平台，而且持续强化了他们作为民族代言人的角色认同。因此，在有利的社会环境和政策支持下，民族作家们更有可能积极投身于民族文学的创作之中，通过文学形式传达其族群的声音与视角，以此强化民族的文化特色和精神追求。无论是“主体的流动”，还是“流动的主体”，文本中构建出“乌托邦”亦或“异托邦”，这种内视的我族建构是一种从文化内部弥合传统，再塑话语的手段。当然我们可以用“自我风情化”来批评其为博取利益而将本族文化作象征资本加以滥用的行为，因为如前所论，这样的书写难免将少数民族地区形塑作犁平欲壑、安置灵魂的异域或法宝。但同时，若将这种现当代文学场域中再常见不过的本土叙述方式视作少数民族文学“数典忘祖”的“罪孽”，因其追随主流文学的视角而导致的机械刻板就否认这些文学中族裔空间的存在合理性，又何尝不是另一种争夺文学族裔空间构建话语的夜郎自大。

结语

藏族诗歌中的族裔空间并非静态的文化展示，而是一个动态的、多维度的社会实践。它既是个体自我认同和文化归属感的表达，也是社会变迁和权力话语作用的结果。它不仅是个体自我认同和文化归属感的体现，同时也是社会演变和权力话语交织的成果。

自现代中国以来，中国少数民族文学领域逐渐达成了“多元一体”、“多元共生”、“千灯互照”等基本共识。然而，在自由主义多元文化主义思潮的冲击下，人们在信奉文化多样性的同时，会不自觉地忽略中华民族的整体性根基。这种偏向在民族文学塑造族裔空间的过程中，不期然地削弱了在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的中国现代化历程中艰难铸就的“中华民族”国族认同，从而背离国家认同的根本原则。

这种文化倾向不自觉地成为西方新殖民主义话语的摇旗手，为某些群体利用文化差异和“不平等”借口作掩饰，与全球化背景下的新殖民主义势力形成共谋关系。因此，在多元力量的互动中，我们亟需深入剖析族群身份空间的构建机制与发展路径，以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识，明确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定位、生态环境以及其跨越单一族群的交流互动。

Funding: This research received no external funding.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e authors declare no conflict of interest.

References

包亚明编（2001）：《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上海教育出版社。

[Bao Yaming (Ed.) (2001). *Postmodernity and the Politics of Geography*. Shanghai Education Press.]

才旺瑙乳、旺秀才丹编（1997）：《藏族当代诗人诗选（汉文卷）》。青海人民出版社。

[Caiwangnaoru, Wangxiucaidan (Eds.) (1997). *Selected Poems of Contemporary Tibetan Poets (in Chinese)*. Qi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詹明信（1997）：《晚期资本主义文化的逻辑：詹明信批评理论文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Fredric Jameson (1997). *The Logic of Late Capitalist Culture: Selected Essays on the Critical Theory of Jameson*.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吉尔兹（2000）：《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中央编译出版社。

[Geertz C. (2000). *Local Knowledge: Essays in Interpretive Anthropology*. Central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Press.]

George Herbert Mead (1934). *Mind, Self, and Societ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亨利·列斐伏尔（2021）：《空间的生产》。商务印书馆。

[Henri Lefebvre (2021).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Commercial Press.]

刘大先 (2011):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空间话语”, 《民族文学研究》(04): 122-138。

[Liu Daxian (2011). “Spatial Discourse in Chinese Ethnic Minority Literature”. *Research on Ethnic Literature* (04):122-138.]

刘大先 (2018): “‘边地’作为方法与问题”, 《文学评论》(02): 42-49。

[Liu Daxian (2018). “‘Borderlands’ as Method and Problem”. *Literary Review* (02):42-49.]

刘大先 (2020): “族群性, 地方性与国家认同——百年中国文学的满人路径”, 《当代文坛》(04): 117-125。

[Liu Daxian (2020). “Ethnicity, Locality and National Identity - The Path of Manchu in a Hundred Years of Chinese Literature”.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Forum* (04):117-125.]

刘大先 (2024): “边疆自觉, 少数民族文学与当代中国观”, 《兰州大学学报》(02): 54-64。

[Liu Daxian (2024). “Borderland Self-Consciousness, Ethnic Minority Literature and Contemporary View of China”. *Journal of Lanzhou University* (02):54-64.]

李怡 (2020): “‘地方路径’如何通达‘现代中国’——代主持人语”, 《当代文坛》(01): 66-69。

[Li Yi (2020). “How ‘Local Paths’ Lead to “Modern China”-The Language of Generation Moderators”.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Forum* (01):66-69.]

李怡 (2022): “从地方文学、区域文学到地方路径——对‘地方路径’若干研究质疑的回应”, 《探索与争鸣》(01): 63-69+178+2。

[Li Yi (2022). “From Local Literature, Regional Literature to Local Paths--A Response to Some Research Questions on ‘Local Paths’”. *Exploration and Controversy* (01):63-69+178+2.]

刘小波 (2021): “地方路径与文学中国——2020 年中国文艺理论前沿峰会暨四川青年作家研讨会会议综述”, 《当代文坛》(01): 217-223。

[Liu Xiaobo (2021). “Local Paths and Literary China--Conference Summary of the 2020 Summit on the Frontiers of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and Sichuan Young Writers' Symposium”. *Contemporary Literary Forum* (01):217-223.]

吕微 (2001):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中的学科问题与现代性意识形态”, 《民族文学研究》(01): 7-15。

[Lv Wei (2001). “Disciplinary Issues and the Ideology of Modernity in Writing the History of Chinese Minority Literature”. *Research on Ethnic Literature* (01):7-15.]

布迪厄 (2001): 《艺术的法则: 文学场的生成和结构》。中央编译出版社。

[Pierre Bourdieu (2001). *The Laws of Art: The Generation and Structure of the Literary Field*. Central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色波编 (2002): 《前定的念珠: 诗歌卷》。四川文艺出版社。

[Sebo (2002). *The pre-determined rosary: a volume of poetry*. Sichu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汪晖、陈燕谷编 (1998): 《文化与公共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Wang Hui, Chen Yangu (Eds.) (1998). *Culture and Publicit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姚新勇 (2016): 《文化民族主义视野下的转型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花木兰文化出版社。

[Yao Xinyong (2016). *Chinese Minority Literature in Transition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Nationalism*. Hua Mulan Culture Press.]